导　言

(一)

世纪之交，各门学科都在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回顾本学科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总结本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二是展望本学科在21世纪的前景，为自身将来的发展规划蓝图，明确使命。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光辉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也是时代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然而，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展望其在中国的未来，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如果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特点，我们便能依据这些特点，逐步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皆是首先从唯物史观开始的，因此，我们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考察，是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展望其在中国的未来的首要方面。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点，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首先是从唯物史观开始的呢？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毛泽东等都是首先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首先是历史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社会变革新道路的客观反映。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1920年，蔡和

森和毛泽东在相互的通信中也非常注重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传播。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这些都说明，当时中国初步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首先关心的是中国的命运，注重的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因而首先注重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得到运用和发展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就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篇章。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阶段等重大问题，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唯物史观也首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应该说是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它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并由此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邓小平同志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发展。

唯物史观在中国，其影响由小到大，乃至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圭臬和指南。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使唯物史观进一步系统化、完善化，能够为唯物史观在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因此，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也是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20 世纪后期，在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兴起的改革浪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探索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历史机

遇。无疑，机遇中总有风险，甚至包括倒退和失败的危险。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历史命运受到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些国家的地位一落千丈。据此，国外有的人以新世纪先知的姿态，出来宣布唯物史观的“大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幻灭”。这一历史的洄流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唯物史观在当代及今后中国的历史命运又将如何呢？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形势也迫使我们来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

当今的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中国的主要奋斗目标也已由争取民族独立而转变为实现民族富强。唯物史观能否继续成功地指导这一新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呢？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革命的学说，斗争的学说，在当今的时代，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已成为一种乌托邦理论。然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 用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评说其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因此，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考察，也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所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使大量的西方思潮涌入了中国，同时，近年来东亚及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弘扬民族文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中西之争”再度成为思想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一时间，思想领域呈现出所谓‘多元’纷争的局面。一方面,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思想界的繁荣和“百家争鸣”是有利于思想发展的，这也是改革开放给思想领域带来的又一个春天。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开放性、发展性的学说，它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以吸取人类文明所有健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康和有益方面为基础的。因此，当前思想领域的繁荣局面，对于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是极为有利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有的人借思想多元的现实，别有用心地来消解、排斥，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的主流思想，试图颠覆其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唯物史观的时效性，及在经济发展了的 21 世纪的中国能否继续存在，能否继续发展并取得新的胜利的问题，成为时下摆在理论界面前，并迫切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民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对唯物史观能否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这一看似简单的结论，却总是需要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需要作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总之，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也是当前思想领域斗争的迫切需要。

（二）

我也同样认为，没有哪一种哲学或理论，能如马克思主义一样在现代世界史上留下如此重大的影响，它在俄国和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已数十年，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这一事实在中国是如何可能的，它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怎样，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显然是一个具有头等意义的现代思想史课题。① 不同的是，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了三大部分内容，第一是它的哲学；第二是它的经济学理论；第三是它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完全发挥它的指导作用的，是它的哲学，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也就是说，本文所着重考察的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

①参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6 页。

运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几乎都是以时间为线索展开其论点的，而本书却只想围绕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有关的几个问题来加以考察。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何能够接受唯物史观？中国人民接受唯物史观是在中国的过去，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历史。因此，我们首先不得不去追溯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思想文化相契合的历史轨迹。对于这一段早已逝去的历史的追溯，可以使我们真正了解唯物史观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介绍到中国来，而中国人民为什么在派别纷繁的外来思想中，惟独选择了唯物史观作为自己实现救亡图存的指导理论的，从而用历史的事实证明：唯物史观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民接受，不是依靠名利的诱惑，也不是依靠暴力的强制，更不是由于某种神秘的文化感应，而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人惟一正确的选择，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承担指导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历史使命。

中国人民接受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处在西方列强严重侵略和残酷剥削的重压下，国内的封建势力与西方列强联合在一起,阻断了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因此“走俄国人的路”便成为中国人惟一的选择。二是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首先经历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相抗衡的历史阶段，继而全盘输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但均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相继在中国破产，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超越两者之上的先进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唯物史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演进过程中，被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的。本书的第一章便是以上述两方面的必然性为线索，来探讨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有关的第一个问题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来走过的路程说

明：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导，没有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当然仅指正确的运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没有胜利的可能。而唯物史观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却同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不是一回事。我们只是想指出：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与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间的关系并非是一回事。因此，本书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得的发展，除了要谈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即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新发展的具体内容，就不得不更多地去注视它为什么能在中国得以发展这一问题。本书认为，这才是决定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又一关键所在。

唯物史观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在中国得以发展，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它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深化和扩展。这是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二、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的科学解决，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得以丰富和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因为，如果认为理论决定实践，则必然使唯物史观变成僵死的教条；反之，如果过分夸大实践的作用，忽视和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必然会犯经验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同样不能使唯物史观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要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得以丰富和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之间的辩证关系。三、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得以丰富和发展的方法论条件。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也会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者借口一般规律的普遍适用性来泯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而经验主义则借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来拒斥一般规律的普遍适用性，从而否定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因而两者都不能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得以丰富和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处理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把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为其增

添了新的思想内容。本书第二章拟就以上问题而展开加以说明。最后，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理论失误来从反面对照，进一步加以说明。

与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命运有关的第三个问题是：唯物史观在当今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它在今后中国的前途和走向如何？

由于正确处理了理论和实践、一般与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当上述两种关系得到正确处理时，唯物史观就前进、就发展；反之，唯物史观就被歪曲和误用。然而，唯物史观在中国被歪曲、被误用的时候毕竟是少数和短暂的。今天，唯物史观在经历了又一次曲折之后，重新找到了自己在中国新的生长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走向了新的发展之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但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再次得以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预示着唯物史观在今后中国的美好未来。

自鸦片战争始，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便是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富强，而实现这一理想和目标的必由之路，便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起始于国人的自省，而是来自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催逼。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必然地区分为两个阶段，即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和现代化建设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现代化扫除障碍，这一历史任务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告完成。 第二个阶段虽然说自新中国建立以后便已开始，然而，从 1949 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近三十年里，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本身又充满了曲折，被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和“十年动乱”所打断。中国人民再次从走向现代化的航程中游离出来，偏离了这一走向富强的历史任务。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走上正轨，开始了全面探索、全面建设的新时期。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我们才说邓小平理论是在当代中国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说它是在当代中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对唯物史观的继承，是因为这一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全面探索，是现代化这一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主题的继续；说它是在当代中国对唯物史观的发展，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使现代化建设走上了正轨，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成为唯物史观在当代及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继续发展的现实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是全体中国人民在当代及下个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唯物史观在与这一伟大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随着这一实践的日益深入，唯物史观也将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为自身在今后中国的兴旺发达找到更为坚实的基础。以上便是本书第三章的主要内容。

我们知道，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它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性。然而邓小平对民族独特性的强调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国情’和当今世界的‘世情”的切实而科学的考察得出的正确结论，而不是不顾中国的现实，把中国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当中游离出来，固守偏执保守的民族狭隘性，从而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的。当代新儒学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与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肩的，然而它假借对中国民族性的强调，以弘扬和振兴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进路，借对外来文化的排拒来消解和攻击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宣称‘21 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从而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构成了一种挑战。

当代新儒学在中国兴起的历史背景，恰与唯物史观被中国人所接受的历史背景相同。同时，它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长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主要理论派别之一。由于中国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被人们已普遍认同了的，所以“全盘西化”和照搬照抄别国的革命

和建设经验的做法，已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所以新儒学强调民族性，振兴民族传统文化以实现现代化的理论颇能给某些人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感。况且近年来东亚各国经济的迅速腾飞，儒家传统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因此，人们开始注意新儒学、倡导新儒学，有的人甚至以它来消解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我们之所以讨论现代新儒学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一度流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否定性的文化思潮，它致力于对发达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的激进否定，后现代主义是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类似现代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使得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种种弊端，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敏感和担忧，一度曾津津乐道于后现代主义。然而，后现代主义只行解构而不事建设,这就使得‘既吸收西方先进之处,又克服其弊端’的当代新儒学，受到了某些人的青睐。这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当代新儒学不仅能够接续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并加以创新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还能克服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使人们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产生了种种忧虑。

对当代新儒学理论的评说，一是为了克服这种理论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指导地位的消极影响，二是为了说明唯物史观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惟其如此,它才能在‘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①。以上便是本书第四章的基本内容。

总之，本书围绕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几个问题，紧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2 页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题，力求揭示唯物史观在中国历久弥新的秘密所在。

第一章
中国为何能够接受唯物史观

在几乎整个 20世纪当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实际相结合，给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世纪相交之际，它给予人们的仍是无尽的话题：它在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它在中国的过去自然已成为历史，而对于它在中国现在的反思以及对它在未来的展望，我们也不得不从头开始，去远溯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思想文化相契合的历史轨迹。通过这一历史的追溯，我们将会看到，唯物史观之所以能被广大的中国人所接受，是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使然。

第一节　时代和国情分析

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接受唯物史观，这是和当时的历史时代有紧密联系的，同时也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一、时代的分析

唯物史观和中国的近代历史是随着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开启而生发出来的。其实，远在中国的近代历史开端的三四百年之前，这一新的世界历史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是这一新的历史时代到来的显著标志。商业新航路的开辟把世界历史也引导到了一条新的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路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诞生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由萌芽到滋长，进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资本主义一经产生，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就必然不断扩大市场和交换的范围，深入并占有原来封闭的农本经济的阵地，无止境地向可能达到的各个角落扩展。它突破地理的自然界限和国家疆域，最大限度地为其销售商品而开拓市场。由中古后期积累起来并得到改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为资产阶级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于是，世界不再只是以亚欧大陆为主体的文明世界。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东西两岸，稍后还有大洋洲，都加入了以亚欧大陆为主体的文明世界。世界的范围空前扩大了。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闭关自守状态越来越被彻底地打破，世界也变得更为紧缩了，由分散的世界渐渐成为一个初见其全貌的整体世界。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才开始成为世界历史。这是从原始人类为寻找食物向地球各地移动，直到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这一经历悠远行程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 其二，“物质的生产如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6 页。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①,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在 1840 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而且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然而与世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此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输入和借鉴为主。“19 世纪 40 年代到世纪末，东渐的西学主要是随着工业而兴起的现代科学技术、进化论学说、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20世纪初,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易卜生主义、属于‘科学一实证’思潮的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的叔本华哲学及‘世纪末哲学’——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学说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②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历史的洪流中，使得文化的交流具备了前提条件，为各种外来文化的输入铺平了道路，这就在客观上为唯物史观的传入、传播及日后为中国人所接受提供了第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国情的分析

1840 年以后，中国也被卷入到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也由此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在考察社会经济生活的变更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③。在这里，我们首先从对中国“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的考察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6 页。
②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1—392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手，揭示近现代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揭示唯物史观被中国人所接受的社会经济条件。

从春秋战国时起（也有人认为是从西周开始，或是从秦统一中国开始)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始终是作为完整的封建社会而存在的。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封建时期，有的经历了 10 个世纪左右,有的经历了 12、13 个世纪,有的经历了 15 个世纪左右，而中国完整的封建经济却延续了两千多年。纵然是在 1840 年以后，“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①。总之,中国的封建时期漫长的延续、发展过程，虽然也可以划分为几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中国社会当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在 1840 年以前，尽管有所发展，但毕竟处于萌芽状态。同时，相比较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秦汉比战国时期有所发展，唐宋比秦汉时期有所前进，明清较唐宋时期更为进步。典型的封建经济的延续和长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在中国也长期受到了抑制和阻碍。 1840 年以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虽然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②。封建经济的长期存在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不到长足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总的来说，中国封建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虽然鸦片战争前社会矛盾激化，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如无外国列强的入侵，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些发展（虽然帝国主义列强的初衷并不是想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0 页。
②同上。

还需要更长的时期，至多是在封建社会形态的前提下，推动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第二，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延长了封建社会的存续期。中国封建时代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就必然促使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延长了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

第三，在中国，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和完整的封建经济统治相伴随，地方经济成为专制主义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前提。封建经济常有兴衰不定而影响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土地买卖和货币地租以及所谓经营地主和富农式经营主要同传统的封建地主经济相结合，商业资本的发达主要同封建地主经济相结合，商业发达主要同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政权相结合，封建官府、封建大地主、封建大官僚、封建大商人的工商势力居垄断地位，压迫私人普通工商势力，城市没有成为封建农村的对立物，而是同整个封建经济融合在一起，商品货币经济和市场关系虽然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封建统治阶级的商业活动比农民多，封建经济的发展既有早熟的进步性，又具有停滞不前的落后性。这些情况，一方面构成长期延续的封建经济内容，同时又成为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经济条件。

第四，中国的封建官府和封建地主以及封建官僚既握有大量土地、垄断农业、占据农村,又握有商业高利贷资本、垄断工商业和贸易、占据城市 同时,在社会上往往形成为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三位一体的统治。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所受的封建剥削格外深重，封建专制国家政权又对他们实行残酷压榨，劳动人民长期处于极端贫困落后的地位，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商品生产和私人普通工商业得不到进一步发展，致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成长缓慢，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第五,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官有)与私有(主要是私人

地主所有）两种形式贯穿始终，除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外，皆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国有地或官地，在不同时期也有发展变化和具体演变。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是以私人土地所有制（主要是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国有地与私有地虽然有所区别，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上往往有相互转化的情况，既有私有变国有的时候，也有国有变私有的情况。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土地私有构成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流。

六省农村土地调查*

（1933 年）

阶　层	户　数%	占有土地%
地主	3.57	45.8
富农	6.40	18.0
中农	19.60	17.3
贫农	70.50	18.4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1933 年六省农村调查总结。《农村复兴委员会报》1933年版。

*原编者注 六省为 陕西、河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

由此,封建经济形态的长期存在和根深蒂固,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无法迅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也正是看到了中国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及其反动性，才日益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依附于自己，来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

中国的封建势力严重地抑制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及其对中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更加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法达到它们已经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列宁说：“强制地向东方各民族移植的外国帝国主义，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的社会与

经济的发展，剥夺了他们达到欧美已经达到的水平的可能性，因为帝国主义的政策力求阻止殖民地工业的发展……’①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是倾销其商品和变中国为其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供应地。但甲午战争之后，它们对华投资侵略大为扩展，在铁路、矿山、工厂、银行、贷款、土地掠夺等方面都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以及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使得中国本国资本主义，虽然较封建时期有所发展，但不能取得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而且本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联合，大有使本国资本主义生命枯竭的趋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实现国家富强的可能性被完全消灭掉了。然而，社会向前发展的趋势又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人的强国梦不会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而泯灭，于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毅然走上了俄国人的道路。同时，这也是当时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十月革命是依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取得成功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和不断壮大。因为，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不仅是新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更是唯物史观之所以被中国人接受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② 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50 年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已开始有一些穷苦劳动人民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渐渐多

①《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8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